

主体性的弥散

◎ 洪治纲 著

经过十余年的磨炼，学院批评悄然建立起了“一座辉煌的批评大厦”，逐步改变了当代文学批评的迷茫而又喧嚣的状态，重新确立了文学批评的合法性，并显示出具有本土经验的、充满活力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趋势和广阔前景。《学院批评》文库几乎囊括了近十年来学院批评的中坚力量，是对学院批评的一次全面检阅。他们以锐利的学术眼光阐释当代文学，自主地参与到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过程当中，大大丰富了当代文学的精神内涵。他们各自独立的思想品格和理论风采，把学院批评大厦建设得坚实而多姿。

学院批评文库

刘中树 张学昕 主编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主体性的弥散

◎ 洪治纲 著

刘中树 张学昕 主编

学院批评文库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主体性的弥散 / 洪治纲著.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9. 9
(学院批评文库 / 刘中树, 张学昕主编)
ISBN 978-7-80762-391-5

I. 主… II. 洪… III. 文学批评 - 中国 - 当代 - 文集 IV. I206.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5191 号

网 址: www.360hours.com
邮 箱: expresskey@yahoo.cn
发行电话: (0431)86012826 (Fax)
(0431)86012675/86012812

主体性的弥散 洪治纲 著

出版人: 杨 枫
责任编辑: 孙骏骅
封面设计: 李立嗣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130021
发 行: 吉林出版集团外语教育有限公司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130011
印 装: 长春市良原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 960 1/1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9.75
书 号: ISBN 978-7-80762-391-5
定 价: 29.00 元

总 序

刘中树 张学昕

去年春天，在酝酿这套学院文学批评丛书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在今天这样比较复杂的文化、文学语境中，谈论和思考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界定这种文学活动的学术品质，梳理出它的发展脉络，或者说给今天的文学批评命名，实际上已经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当代文学的话语方式、话语背景和学术空间都获得了非常大的拓展，文学批评所显现出来的影响力，它在当代文学学科的意义和学术价值已世所共睹。文学批评持续着它整体活跃的态势。但是，近些年，那些“批评缺席”、“批评有无存在的必要性”的质疑、诘责之声仍时而响起。当代文学批评遭遇到市场经济的冲击，似乎陷入到失语和能指匮乏的困顿之中，很大一部分批评空间正悄然被诸多媒体所占领。文学批评的责任与承载力究竟是什么？文学批评应有什么样的形态、格局和秩序？批评的伦理和能力、批评的学术化、批评家的身份等问题，都开始困扰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与批评。

回望这些年来的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的确是有太多的文学与非文学的因素，特别是种种体制内的评价机制，都很严正地考验着我们的批评品格。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的“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学术背景下，批评的“学院化”取向愈益突出，也给当代文学批评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在这样的学术风尚中，虽然学院知识生产的先天优势被充分地彰显出来，知识、学问谱系化，精确、严谨的学术生长态势确实得到强化，但是，另一个令人堪忧的、窒息学术生命力的因素同时也被极大地扩张，大量的被称之为“正确的废话”的所谓研究论文开始大量涌现。而这种形态的最终结果，可能就是学术研究的新模式化的产生和僵化，进而导致批评的学术活力和思想力量的真正丧失，这与学院批评所应具有的“有学术的思

想”和“有思想的学术”的境界完全是南辕北辙。而对于批评来说，面对鲜活的文学现场，置身于“学院语境”中的学者型的学院批评家，若想摆脱掉可能有的身份危机和学科禁忌，就不得不重新考虑文学批评的命运和使命。因为，无论是理论还是批评，在任何时候，都已经不是单纯的智力活动，而是一种有意味的文化思考、道德考量和学术底蕴的丰盈与否。批评究竟应该有什么样的担当，今天的文学批评对学科话语的成熟，对文学史写作及其文学生态应该有怎样的贡献，就成为摆在学院批评家面前的重要课题。

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位列这套“文库”的二十位学院批评家，正以他们文学批评写作的实绩、卓著的影响力，捍卫着批评的权威性和文学的尊严。这个批评家群体，凭借他们特有的活力、稳健和能动性，正形成一个新的批评风范和批评秩序。这种批评以或厚实或灵动的话语魅力、清醒的判断力，以及理论的热情、能动的解读和阐释，充分地显示了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个不俗的高度。我们体会到，在这里，批评确实是一个抵达心灵的创作性活动，是有灵魂重量的精神言表。活力与激情，学理与思想，深邃与轻盈，宏阔与精致，都充溢在他们文字的字里行间。还有，批评的权威性与公信力，对时代和文学发问的能力，理论背景和批评立场，也都在他们执著而坚定的批评活动中尽显无遗。他们对我们时代文学的审美判断、话语方式，批评秩序的重新建构，已经在整体上开始改变当代文学批评的语境和“情境”。不夸张地说，学院精神的纯粹和魅力，在当代文学批评的空间维度里获得深刻的锤炼和彰显。

可以说，《学院批评文库》几乎囊括了近十年来学院批评的中坚力量，是对学院批评的一次全面检阅。他们以锐利的学术眼光阐释当代文学，自主地参与到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过程当中，大大丰富了当代文学的精神内涵。也正是他们各自独立的思想品格和理论风采，才使学院批评变得坚实而有声有色。

当然，我们也清醒地感到，文学批评在今天所面临的深刻的挑战和许多待解的问题。近年来，我们总是在不断地强调和思索当代文学写作的“原创性”问题，那么，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原创性”是什么呢？我们总是渴望和期待文学创作给我们增加更大的内心含量，我们需要认真反思反省，当代文学批评是否向人们敞开了心扉，演绎本色的灵魂之舞呢？视野开阔了，但内心视

域狭小了；对文学的宏观生态有了高屋建瓴的把握，但对许多独特文学个案的精彩阐释、分析却显衰微；有了雄心勃勃的“建构”的自信，却缺少“苦心孤诣”的“妙思”。而且，写作与批评这两条并置的“铁轨”，如何在生活坚实的地基之上，承载文学列车的驰骋，相互支撑、牵引和共同延伸？像这样涉及写作与批评关系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学院体制内的量化指标、科研制度，极大地禁锢着学院批评家对文学本身的热情和激情。一旦批评家丧失掉对文学精神的真诚旨趣，必然导致批评家远离鲜活的文学现场，走进苍白而贫乏的困境。

无疑，我们时代需要更多富于激情的成熟的批评家。应该承认，相对于文学史写作和文学纯理论研究，文学批评似乎承担着更大的“风险”。它所做的追踪式的、持续的、不倦怠的工作，必然要经过时间的检验和过滤。因此，它需要直面一切现实和文本的勇气与目光，需要科学、理性和公正的审美判断力。批评的价值立场、伦理操守、专业品质，在我们今天这个喧嚣的年代尤为珍贵。最重要的是，我们对这个时代的那些优秀的作家满怀信心，同时，我们也对这一个学院批评家群体充满期待。我们相信，我们会在他们的写作和创造中，感受到这个时代生活清新的气息和美好的未来。

这里，我们想说明的是，这套丛书的编辑工作是由吉林出版集团外语教育出版社负责承担的。在此，我们要表达对总编辑杨枫博士的衷心感谢。正是他们对文学的热情，执著而坚定地坚持这套丛书的编辑，才使得这套学术丛书在图书市场渐显颓靡的当下能如愿出版。

最后，我们还是期待读者、期待学界朋友们的热忱指教。相信在这里，同样有我们之间真诚而丰富的内心交流。

目录

第一辑 融会与整合

主体性的弥散	
——对 90 年代文学的一种反思	3
多重文体的融会与整合	15
底层写作与苦难焦虑症	30
魏晋风度与“鱼道主义”	44
想象的溃败与重铸	53
谎言是何等的楚楚动人	
——《2004 中国最佳中篇小说》序	72
缝隙中的呓语	
——20 世纪 70 年代出生女作家群的当代都市书写	82
短篇小说，或一些问题	95

第二辑 阐释与质询

贾平凹：困顿中的挣扎	109
尤凤伟：知识分子的另一种书写姿态	128
史铁生：“心魂”之思与想象之舞	146
阎连科：乡村苦难的极致之旅	165
艾 伟：人性的勘探与诗意的表达	184

陈昌平：幽暗深处的历史回响·····	197
潘向黎：在隐秘的女性空间里游走·····	205
张惠雯：让叙述在灵性的语词里曼舞·····	214

第三辑 解析与重构

民族精魂的现代思考	
——重读《白鹿原》·····	221
具象：秘密的交流与永恒的悖论	
——论韩少功的《暗示》·····	233
形式·成长·语言	
——论林白的《致一九七五》·····	246
承纳与救赎	
——论范小青的《赤脚医生万泉和》·····	256
1976：特殊历史中的乡村挽歌	
——论毕飞宇的《平原》·····	267
在裂变中裂变	
——论余华的《兄弟》·····	280
“史诗”信念与民族文化的深层传达	
——论刘醒龙的《圣天门口》·····	294
后 记·····	305

主体性的
弥散

第一辑

融 会 与 整 合

主体性的弥散

——对 90 年代文学的一种反思

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来说，上个世纪 90 年代既是一个主体性高扬的年代，也是一个主体性弥散的年代。其主体性的高扬，在于人们借助多元化的文化背景，将“存在即合理”的生存法则引入审美价值谱系之中，使个人的世俗欲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彰显。而这种彰显的结果，便是导致了很多普世价值的崩落，以及人类长期以来引以为荣的各种宝贵品质的缺席、失散甚至被贬抑。这也意味着，主体性看似获得了全面的张扬，而在无序纷乱的“张扬”之中，在作家们的肆意挥霍之中，却变成了一种大面积的弥散。

这种弥散是自发的，也是令人忧伤的。它让我们看到，由 80 年代文学前辈们艰辛营造出来的有关主体性的自觉意识，在世俗伦理的侵蚀下，迅速地演变成一种为所欲为式的狂欢。它看起来没有权力的干扰，实则依然处于被劫持的状态——不过，它不是来自于意识形态的控制，而是来自于物质利益以及世俗社会身份的潜在规约。

因此，重审 90 年代的文学创作，我们在沾沾自喜于某些已有成就的同时，或许还应该看到主体性的弥散，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结果。也就是说，我们或许应该从作家主体的角度，来回顾并总结一下我们的得失。

—

我之所以选择主体性来审度 90 年代的文学发展状况，是基于这样一种体认：在漫长的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主体性一直混沌不明。五四新文化运动首次打出了“人的文学”的主牌，使中国现代文学开始关注人（尤其是普通人）

的生命性状及其生存状态，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甚至举起了性灵的大旗，主张文学回到创作主体的内心世界。但是，在革命文学的历史语境中，中国现代文学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作家主体性的内在属性，它充其量只是在表达对象的主体性上获得了较好的发展。特别是在二三十年代，各种文学社团和流派之间不断产生纷争，主体性的激情不断迸发，而最终的结果，在“救亡”的历史境域中，文学却很自然地归附于“大众化”的写作路途。

虽然“大众化”的写作口号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在“谁是大众”和如何“大众”上，不同阵营里的作家却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从左翼文学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到30年代肇始于郁达夫主编的《大众文艺》的三次较大规模的“大众化问题讨论”，其结果都是如此，连向来主张作家主体自由的郁达夫自己也被逐出了“大众”之列。40年代的胡风 and 舒芜一厢情愿地“论主观”，搞“主观战斗精神”，以期充分发挥作家主体在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中的作用，当然也成为革命文学批判的对象。可以说，直到80年代初，我们的文学主体性并没有获得充分的发育。它构成了现代性在中国现代史上所布演的一道令人伤痛的情形。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80年代的文学主体性逐渐苏醒。尤其是以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一文为标志，以及围绕着这篇文章所引出的大范围讨论，从作家的主体到表达的主体、接受的主体，人们终于慢慢地获得了一种文学自律性上的体认。

而到了90年代，我们却意外地发现，这种构筑于文学自律性上的主体性，却从作家主体的内部自觉地、也是隐秘地发生了改变。

这种改变的典型事件，便是“人文精神大讨论”。1993年6月，《上海文学》发表了王晓明等人的对话《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由此揭开了这场历时数载的大讨论之序幕。在这篇对话中，沪上学者针对当时文坛已出现的种种精神滑坡现象，明确地指出，它们“不仅标志着公众文化素养的下降，更标志着整整几代人文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文学危机实际上暴露了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危机”。“这种危机在作家创作方面有两种表现：一是媚俗，一是自娱。”所谓“媚俗”，就是“文学没有自己的信仰，便不得不依附于外在的权威。一旦外在的权威瓦解了，只有靠取悦于公众来糊口”。像后

期的王朔就是如此。所谓“自娱”，就是“好比找不到用武之地的拳师，或者去走江湖，靠卖狗皮膏药度日；不然就得回家去，自己打拳健身”。^①最典型的的就是拍摄了《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张艺谋。

应该说，这是他们针对当时文学主体性的滑落而作出的一次敏捷的反应。为此，他们还站在一种普世价值的立场上，理性地指出：“真正的当代文学应该敢于直面痛苦和焦虑，而不应用无聊的调侃来消解它；应该揭发和追问普遍的精神没落，而不应该曲解西方理论来掩饰它。”^②而且，随着讨论的深入展开，我们注意到，已有学者开始意识到这是一种关涉作家主体性的问题了。譬如王彬彬就在一篇对话中说道：“人文精神如果理解为批判性与否定性，那么人文学者、知识分子则必然站在现实的对立面上，而若站在现实的对立面上，则必然要有一个价值立脚点。这立脚点不能是世俗的、经验的，它必须具有神圣和超验的性质，而这只能是一种具有宗教性的东西。”^③如果讨论能够沿着这种预设的思路发展，我以为，势必会对文学的主体性（尤其是作家的主体性）和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承担进行一场极具价值的探讨。但遗憾的是，这场讨论最后却意外地陷入了两个怪圈：

一是卷入了对“人文精神”概念的纠缠。经不住一些质疑的声音，包括发起人陈思和、张汝伦等很多学者，最后都不得不借助古今中外的知识谱系，重新梳理“人文精神”的内涵和沿革。但这种概念的阐释又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更多更大的争论。这样一来，讨论慢慢地转变成一种学理上的纠缠，而对人文精神的失落与重建的问题，以及对当时文坛所存在的种种隐疾的揭示与批评，却在无形中被搁置起来。

二是讨论受到了王蒙等人的深度质疑。王蒙以一个历史受害者的身份，非常警觉地意识到：“一种高尚的利他的精神追求，可以是人文精神的高扬与升华，也可以走火入魔，成为制造苦、折磨与毁灭自己与别人的敌视人文精神的怪物。”为此，他以“躲避崇高”为盾牌，尖锐地质疑人文精神的讨论：“一、

① 王晓明等：《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

② 王晓明等：《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

③ 吴炫等：《我们需要怎样的人文精神》，《读书》，1994年第6期。

不要企图人为地为人文精神奠定唯一的衡量标尺。二、不要企图在人文精神与非人文精神中间划出明确无疑的界限，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三、不要以假定的或者引进的人文精神作为取舍的唯一依据。就是说不要搞精神价值的定于一与排他性。”^①王蒙显然为一种自由主义的价值立场在进行辩护，其潜意识里，还是担心刚刚形成的多元化文化格局会被重新“一元化”。

其实，王蒙等人的担心是多余的，他的“三不要”也是完全不合逻辑的。因为这场讨论的核心目标是批评文学界的“媚俗”和“自娱”，即，批评作家面对市场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在主体性上的自觉放弃。这种自觉放弃的可怕在于，它决不同于以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剥夺，而是自下而上的自愿性奉迎。换句话说，在90年代初期市场经济的到来之际，大批的作家下海经商，一些作家改头换面来迎合文化消费市场，作家主体的价值信念、道德良知和艺术操守大面积地崩落，他们更换思想就像更换内衣一样随便，更别说在他们身上重铸一种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了。对于这样的情形，难道不值得追问和批评吗？

在这场大讨论中，由于讨论的核心概念不断被转移，讨论本身也渐渐地变得离文坛现状越来越远——尤其是面对当时的作家心态及其存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这场人文精神大讨论中，只有学者自己在热闹，却鲜有作家参与（只有王蒙等极少数人）。是作家们不屑、不愿还是不便？

随后的文学发展可以证明，更多的作家或许是不愿或不便。因为，在90年代的几种较有影响的创作现象中，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作家主体性的张扬，不是作家对一种文学信念的坚守，也不是作家对自身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精神操守的维护，恰恰相反，而是作家主体性的弥散与漂移。

二

这种主体性的弥散和漂移是双向的。其中之一，便是以虚弱的“现实关怀”向公众输送廉价的道德化的伦理信念，然后借助这种道德化的伦理姿态，

^① 王蒙：《人文精神偶感》，《东方》，1994年第5期。

在攫取世俗利益的同时，巧妙地遮掩主体性滑落和漂移的真相。从喧嚣一时的“新现实主义冲击波”到“反腐小说”，可视为这方面的典型。

90年代中期，以河北的何申、谈歌和关仁山为代表的“三驾马车”异常热闹地出现在文坛之上。很快，其他作家也尾随其后，由此簇拥成一支相当庞大的“马车队”，满天尘土地在中国大地上纵横南北，并构成了“新现实主义冲击波”及其以后的“反腐小说”大潮。其代表性作品有：谈歌的《大厂》、《家园笔记》，何申的《年前年后》、《信访办主任》，张平的《十面埋伏》、《抉择》，周梅森的《人间正道》、《天下财富》、《中国制造》、《至高利益》、《绝对权力》，柳建伟的《北方城廓》、《突出重围》、《英雄时代》，关仁山的《风暴潮》以及王跃文的《国画》、《梅次故事》，陆天明的《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等等。尽管这些小说的叙事重点各有不同，有的强调对社会改革中出现的各种生存困顿的揭示，包括底层平民因体制和观念的变更而引起的内心迷惘与欲望本能的挣扎，有的极力披露官场体系中各种丑陋不堪的游戏规则，展示权力结构中的相互倾轧与腐败。但是，它们体现出来的主体意识都是一致的，即，作家们都试图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将自己的叙事建立在一些社会生存的焦点现象之中，自觉地充当社会代言人的角色，从公众关注的现实命题中果断地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以直面现实的姿态来体现自己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

按理说，作家作为社会中的一员，无论是从艺术操守和良知上，还是从个人的使命和义务上，进行这样的艺术追求都是无可非议的。况且，中国作家在整个20世纪基本上都是在充当社会价值代言人的角色。他们自觉地将自己纳入主流意识形态之中，以公众所期待的社会责任感，直面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生存弊端，以引起社会决策者们的注意，从而促动社会向更加合理的方向前行，并且也确实取得了许多显在的实绩。如果从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上看，他们无疑或多或少地体现了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特殊秉赋和艺术良知，至少也体现了知识分子对整个社会生存秩序与历史命运的真切关注，如早期的巴金、茅盾等作家都是如此。但是，现在重新审度这些“新现实主义”小说，我们却感到，无论是作家的叙事姿态，还是作品本身的艺术质量，就其知识分子的立

场而言，都让人十分怀疑。

从表面上看，作家们满怀豪情地把叙事焦点对准当下的生存境域，对准人们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生活矛盾，力图以关怀的姿态来展示经济体制变更时期的严峻现实，展示国人在这场社会迁徙过程中的种种喜怒哀乐，揭示改革的阵痛与人们心灵伤痛之间的共振关系，其创作主体的内在立场似乎有着不容置疑的正义性，在某种程度上也的确代表着广大民众的心声。尤其是那些以反腐为叙事内核的官场小说，如王跃文、陆天明、柳建伟等人的长篇，与我们所强调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有着不谋而合的精神征兆。然而，如果真正地深入到这些文本之中，我们便会发现，这些作品还只是停留在现实问题的表层状态上，要么只是满足于对官场规则和游戏方式的猎奇式描述，要么只是满足于对人性欲望的放纵式书写，要么只是满足于官场人物在道德良知上的自我挣扎与堕落，既缺乏对权力背后所蕴含的传统文化痼疾的深层挖掘，又缺乏对权力本身在现代社会体制中所造成的巨大历史伤害进行深远的思索，其批判的有效性 and 尖锐性都非常有限。像王跃文的《国画》、《梅次故事》和柳建伟的《北方城廓》完全是一种政治黑幕小说，除了沉迷于对一些官场中隐秘而低俗的欲望冲突的演绎，为那些当官者不断地寻找道义与人性上的平衡点（如王跃文笔下的朱怀镜），实则并无深刻的警示意义。就像雷达所说，这些作品“基本停留在表象层，停留在形而下的展示，超越的部分薄弱，对人的境况和人的发展也缺乏形而上的深思”。^① 事实的确如此。在这些作品中，我们根本看不到作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强烈的抗争姿态，更看不到他们面对如此沉重的现实所引起的内心焦灼与伤痛。

在张平、周梅森以及陆天明的一些系列小说中，作家们虽然对现实生活的切入角度较以前多变，力图表现出现实生活的丰富性和人物精神的深刻性，但是，当他们触及到权力争斗的核心地带，触及到体制结构的关键部位，便立即改变自己的叙事态度，让人物不断地依靠道德的力量来完善自身，然后借助这些身居要职、被道德化了的人物来充当所谓的“权力英雄”，从而“合情合理

^① 雷达：《现实主义冲击波及其局限》，《文学报》，1996年6月27日。

地”解决那些原本无法缓和的现实冲突。如果撇开《十面埋伏》中的代英、罗维民、何波、史元杰等铁肩担道义的公安英雄，像《抉择》中的市长李高成，《人间正道》中的市委书记吴明雄，《绝对权力》中的纪委书记刘重天，《至高利益》中的李东方、贺家国，《英雄时代》中的史天雄，《苍天在上》中的市长黄江北，《省委书记》中的省委书记贡开宸，在性格上都有着极大的类同性——他们都是以自身的凛然正义和人格尊严不断地与那些自私者、险恶者甚至是政治流氓式的人物进行不留余地的斗争，并最终凭藉权力的优势击败对手。这种极其类同化的人物身份及其道德品性，显然不是作家对现实生活的客观体现，而是充分暴露了创作主体理想化、观念化的叙事陋习。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权力英雄的背后，还隐含了作家们极为潜在的奴性意识——把社会的希望寄托于某些有良知的权力身份，而不是通过平民自身的努力来回应现实的困顿。也就是说，他们是以一种虚浮的道德理想主义方式，对现实矛盾的尖锐性做出了某种合理的妥协，而这种妥协又可以轻松地笼络大众的期待心理，绝非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警惕性和非妥协性的精神姿态。他们甚至是借着知识分子的批判名义，悄悄地迎合某些主流意识形态，其立场的暧昧性不言自明。

我们说，真正意义上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要求作家必须拥有独立自主的精神空间，彻底地挣脱主流意识的牵制，摆脱一些道德理想主义的潜在干扰，以民间化的价值立场和知识分子特有的审视姿态，对社会现实中各种不合理的生存秩序与不公正的体制结构进行不留余地的揭示和批判，从而凸现出作家自身的价值标尺，而不是停留于简单的道德层面上，让人物在好与坏的二元对立模式中来完成作家对社会现实的是非判断。它应该不断地探入到权力结构的潜在部位，努力发掘权力体系中所隐藏的丰富复杂的文化内蕴和人性本质，让人们真正地看到权力背后的社会真相，以及它们对人类历史演进所构成的潜在危机，显示出作家应有的深厚的人文传统和强大的悲悯气质，折射出创作主体沉浸于现实之中又超然于现实之外的意志和力量。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检视上述这些小说，说实在的，除了阎真的《沧浪之水》和刘醒龙的《痛失》、《弥天》等极少数长篇真正地写出了一些权力挣扎中的生存之痛，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与体恤情怀之外，其他作品所显示出来的知识分子立